

· 文学研究 ·

# 《血海》中新加坡肃清大屠杀的 创伤记忆书写\*

朱大伟

(赣南师范大学 新加坡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抗战胜利后,南洋华侨谢松山基于日据时期自身和其他战争亲历者的苦痛经验,著就一度创南洋出版记录的旧体诗集《血海》。该书秉承中国诗史书写民族苦难的叙事传统,充分发挥诗史题材纪事、感事之长,从创伤性质、受害人性、创伤受害人与更广大受众间的关系以及责任认定4个向度再现了华人群体对肃清大屠杀的集体创伤记忆。谢松山这段创伤记忆书写的旨趣并非在于铭记仇恨或寻求复仇,而是寻求在集体和普世的语境下,通过赋予其形塑人类道德伦理和未来命运的普遍意义,把个体血淋淋的交流型记忆转化为华侨集体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创伤,并最终藉此实现纪史、存史、治愈创伤以及建设世界持久和平的记忆之责。

**关键词:**新加坡;昭南《血海》;肃清大屠杀;文化创伤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8)05-0068-09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军随后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对华人社群实施了以清除抗日分子为目的的大检证和惨绝人寰的“肃清”<sup>①</sup>大屠杀,造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所实施的除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外的第三大战争暴行。在其时华侨眼中,“新嘉坡检证大屠杀案,为日寇南侵暴行中最为惨无天日者,亦吾侨血泪史中最惨痛之一页也。”<sup>[1]</sup>肃清大屠杀“写下人类历史上最卑鄙龌龊的一页”。<sup>[2]</sup>这一段惨痛的经历在战后新马华人社会中成就了诸多体裁多样的申诉日军暴行的创伤文学,至今依然是新马抗战文学的热点话题。著名华侨报人谢松山<sup>②</sup>所著的旧体诗集《血海》则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作品之一。该书受到当时新马华人社会的极大关注,“出版后万人传诵着,父兄昭示其

子弟,子弟转告其朋曹,痛定思痛,祇(只)见一片泪光”,<sup>[3]</sup>一版、二版都是当天售罄,后复有三版、四版,一时洛阳纸贵,创下南洋出版界的纪录。究其原因,诗集真切地再现了新马华人社群在日据时期所遭受的血泪创伤,勾起他们对这段惨痛经验的集体记忆。

新加坡沦陷后,新马华人正是因之前对祖国抗战救亡运动的支持,才招致随后日军的疯狂报复。面对彼时侨胞的血泪苦难史,我们没有理由无视“新加坡大屠杀中死亡的数以万计生灵绝不应该寂寂无闻”<sup>[4]</sup>的呼声,“在新加坡死去的成千上万受害者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在二战期间日军的战争暴行中应该有应得的地位”。<sup>[5]</sup>然而,当下我国学界对新加坡肃清大屠杀的关注热度,遑论与南京大屠

\* 收稿日期:2018-04-19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8.05.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16KZD020)

作者简介:朱大伟(1981-),男,安徽阜阳人,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及其记忆。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81008.0936.002.html>

① 日本人把这场屠杀称为清除或净化行动,与华语中对屠杀的另一个界称“肃清”相对应,故名。尽管历史学家金庚安(Chin Kee Ann, *Malaya Upside Down*, Singapore: Jitts and Co., 1946.)早在1946年就已经使用它,但该用语在战后1980年代前的中文报刊及其他场合中极少被提及。在中英文媒体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华人大屠杀”和“检证行动”。20世纪80年代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进行日据时期口述史整理工程时,肃清被作为这次大屠杀的名字被采用,之后便开始流行起来。见:Kevin Blackbur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3, No. 2, (2000) p75。

② 谢松山(1894~1965年),南洋著名爱国华侨,福建诏安县城关人。他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香港“圣保罗学院”英文系毕业后任县教育局局长,不久赴港经商。1932年移居新加坡,受聘为《南洋商报》副刊编辑。新加坡沦陷后,谢松山亲身经历了日据时期的种种苦难,战后据此创作了一度创南洋出版纪录的诗集《血海》,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日寇在新加坡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957年,他应邀参加北京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另著有诗集《赤雅轩吟草》等。1965年病故。

杀相比,和奥斯维辛大屠杀相比,也大显逊色。在对大屠杀史实的研究方面,仅有归侨黄浪华,宇之以纪实文学体裁所著的《新加坡大屠杀》和《星洲屠城录——华侨异乡漂泊纪实》两部作品。二者皆以纪实笔法再现了当时新加坡大屠杀的场景和华侨遭受的血泪史,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档案整理方面有张连红主编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通过新加坡人孙建成调查、搜集的560余份新马华人在日据时期受害的档案资料,揭露和控诉了日军侵略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的野蛮罪行。在对新加坡大屠杀集体记忆的研究方面更是薄弱,当前的有限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记忆场所,如“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探讨上。<sup>①</sup>

### 一、创伤、文化创伤及其书写

创伤一词源自希腊文,本指肌体所遭受的伤口,尔后在医学及精神病理学的文献中,特别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才被引用特指心灵的创伤。<sup>[6]3-4</sup>20世纪以来,群体性的创伤事件频发,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士兵弹震症(正式名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人类的大屠杀罪行出现的事实,更是推动着创伤研究中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介入,创伤研究开始超越个体主义和生理主义的藩篱,朝着集体性和文化方向拓展。

当下国际学界的创伤研究主要存在着精神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两个路径取向。美国康奈尔大学凯西·卡露丝教授从心理分析的路径出发,将创伤定义为“创伤描述的是突如其来的压迫性的经验或灾难性的事件,而对此事件的回应通常是延迟的,并常以不受控制的幻觉与梦魇表象进行再现和回返。”<sup>[6]91</sup>她所提及的创伤凸显的是个体所遭受的心灵上的伤害,它被意指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经验事件,而个体对此事件的应激性反应具有一定的潜伏期,这使得创伤必须不断地以叙事方式来呈现,进而彰显了叙事对于建构创伤记忆的重要性。

创伤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则从心理学路径出发,将分析视角落脚在重大创伤历史事件的集体再现上,它强调叙事的集体价值和创伤的集体性特质。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是,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使个体的心理创伤经验迈向文化创伤的意

涵。因为在他们看来,“在社会层面,记忆本身就是一个交流和互动的问题。”<sup>[7]</sup>美国学者亨特·尼格尔在探讨人们理解与战争相关创伤的制约因素时,指出“过于关注个体,而对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文化的世界关注不足”<sup>[8]2</sup>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要因。在西方创伤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倾向中,美国文化社会学学者耶鲁大学杰夫里·C·亚历山大教授在2004年明确提出了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何谓文化创伤?杰夫里·C·亚历山大的界定是“当来自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共同遭遇一个恐怖的事件,并因之留下不可磨灭的永久的记忆,当这种记忆烙印在其族群意识之中,并以根本的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他们未来的认同时,文化创伤便产生了。”<sup>[9]1</sup>他还提醒我们,“把创伤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表明了与心理分析的两个分野,一是它的选择性,二是创伤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社会建构的”“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再现则是另外一回事。”<sup>[9]6</sup>据此,遭受过共同创伤的特定群体,将其遭遇的苦难事件重新整理和再现,并加以诠释、叙述和传播,进而形成一个在更大的群体间得以共享和流转的记忆和苦难,这种记忆和苦难便构成了文化创伤。

那么,何谓创伤书写?可以把其理解为一种把大至国族伤痛,小至个人伤痕的经验作为主要叙事对象的书写风格,也可将其视为一种创伤记忆的建构过程。那么,又为什么要书写过去的创伤经验?作为文化创伤理论的奠基者,亚历山大认为创伤书写与社会责任以及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结,“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乃至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体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为此承付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这种方式原则上使得他们共享他人的苦难。”<sup>[9]1</sup>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揭示了书写创伤行为的历史与现实意蕴。

在文化创伤的建构路径上,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叙事书写和集体再现的成功,必须对以下四个创伤叙事命题做出回答,它关乎一个创伤性事件能否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创伤叙事,进而形成集体的文化创伤记忆,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即:<sup>[9]12-15</sup>

① 可参见:黄浪华,宇之著.《新加坡大屠杀》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张连红主编.《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黄浪华.《星洲屠城录——华侨异乡漂泊纪实》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孙伟.纪念碑上的新加坡:苦难与荣耀的集体记忆,《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5日,第12版。

(1) 伤痛的性质。即特定的群体与其所归属的广大集体到底经历了什么?(2) 受害人的性质。在创伤叙事中,必须要界定哪一群人受到该种创伤的伤痛影响?他们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还是包含更广的“人们”?遭遇伤痛冲击的是单个且有限的群体,还是涉及了若干群体?(3) 创伤受害人与更广大的受众间的关系。即使创伤属性和受害人性质已经确定,依然存在一个受害人和更广大的受众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多数受众在多大程度上能体验并认同创伤直接经历群体的创伤再现经验?通常,在创伤经历之初,多数受众并不能体察自己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经验通过广大集体共享的重要认同特质来再现,受众才能够在符号意义上体认原初的创伤经验。(4) 责任归属。在完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创伤书写时,明确犯罪者,也即“敌人”的身份是很关键的。谁是事实上的施害者?谁带来了创伤?这一点关系到一个表征和社会建构的问题。总之,在他看来,必须先处理好上述的四个问题面向,才能据以形成创伤记忆的基本叙事结构,也即,文化创伤才能因之成功构建。

## 二、诗史之际《血海》的体例沿革及其记忆意蕴

抗战胜利后初期,南洋华侨谢松山《血海》一书初版前的体例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变更。二版和三版的序文、正文也先后都有增补。首先是1946年6月,他署名浩劫余生,将题为《昭南竹枝词》的51首作品陆续发表于《南洋商报》副刊《和平》上。这些诗作都是以七言绝句的形式赋诗,再于其后附以详尽的注释。其主要指陈内容为日据时期新加坡的社会、经济百态以及占领后期日本的败亡情形。这些诗作虽然也揭示有新加坡民众所遭遇的苦难经验,但尚缺少终本《血海》中弥漫的血泪叙事特质和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性的控诉意味。

1947年3月10日,新加坡审判日军发动检证屠杀案的临时战犯法庭开庭。谢松山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出席并纪录了审判的内容,并深受触动。他从受难证人的控诉及日军战犯的供词中,获悉了日军众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丰富并再塑了他对战时新加坡苦难经验的感知,据此又创作了50首和之前《昭南竹枝词》同样体例的诗作,一起以《昭南纪事诗》的题名,分上、下两卷先后发表于1948年《南洋杂志》第2卷的第3期和第4期。

1950年3月,《南洋商报》将谢松山之前陆续发

表的《昭南纪事诗》汇集成册,以《血海》的名称出版。其初版的诗作,较《昭南纪事诗》多了6首,合共106首。初版序文中,除原有序言外,还加入了曾心影等人的四篇序文以及管震民和王受天等人的题词。初版5000千册,不到一日即告售罄。4月15日再版发行8000册,两日内又旋即脱销。同年10月,商报发行《血海》第三版。又增补了两首记述两位华侨侥幸脱险详情的诗作,合共108首。该版也新增了谢松山本人、《南洋商报》编辑曾铁忱、著名书法家潘受以及姚紫、欧阳雪峰等人的序文或题诗,并加入照片约20幅。其中序文多紧扣“血”的主题,凸显了华侨在日据时期的惨痛经验。

从格调轻松的《昭南竹枝词》,到叙事感事特质突出的《昭南纪事诗》,再到义愤填膺,控诉意味鲜明的《血海》一书的出版,体例几经变更。易名背后暗含着作者纪录民族苦难和建构华侨群体创伤记忆的叙事意图和伦理取向的转换,创伤书写的悲情意味也渐趋凝重,也彰显了作品“不为无病之呻吟,而作有凭之实据”<sup>[3]24</sup>的诗史意识的增强。在新加坡学者林立看来,这些变动“隐含了谢松山在回忆向度及作者价值认知方面的转变,显示出他要向传统诗史的道德高度靠拢。”<sup>[10]</sup>《血海》的诗史特质,一方面,在于其创作素材来源于本人的亲身经历、其他亲历者的口述、官方文件和时文报刊的摘录等,这些史料渊源都具有史学要求的相应真实性。书画家潘受在为该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事出纪实,和夸张虚构的小说家言不同。”<sup>[3]8</sup>马来亚华侨管震民在序言中也评价道:“浩劫余生(谢君笔名),手辑是篇,不为无病之呻吟,而作有凭之实据……义正辞严,直秉董狐之笔。”<sup>[3]24</sup>另一方面,诗史特质也体现在《血海》蕴含的寓褒贬、别善恶的伦理判断功能。其序言、诗文和注释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日本侵略者屠杀行为的血淋淋的控诉和鞭笞。新加坡著名报人和作家连士升对此评论道:“这诗学史上的巨著多以史诗的体裁来表现。这100首诗从文字到精神是写实之作,近于史诗。”<sup>[3]22</sup>陈振夏也评之曰:“「浩劫余生」义愤腾,一编血海写层层,口诛笔伐追狐史,留作天南作实凭。”<sup>[3]25</sup>因而,诗集《血海》具有突出的纪史、存史和价值批判的诗史秉性。

历史记忆需要借助文本和非文本形式的载体来建构、呈现和流转,而作为历史记忆构成部分的创伤记忆也是如此。在历史记忆的文本书写和传播中,诗歌中的诗史体裁又有着相对于其他载体形式的独特价值。这一点源于诗史所具有的表心、达心以及

其内嵌的基于想象的建构性两种特质。诗史“是通过个体心灵真实感受体验的表现所反映出的一代兴亡盛衰的历史。它不是社会史、政治史,而是心灵史、情感史。”<sup>[11]</sup>此外,作为文学题材的诗史所具有的建构性与历史记忆的形塑路径存在高度契合,历史记忆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当下的社会建构。法国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就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sup>[12]</sup>诗歌在主张“诗具史笔”和“史具诗心”的钱钟书看来,“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sup>[13]</sup>

故而,诗史具有的这种心史的特征,加上其叙事中的想象建构成分以及感事倾向使得叙事对象更能形象而逼真地深入人的心灵,进而形塑人们的记忆。作为诗人情感凝结与投射的诗史,诗歌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悲吟可以使得苦难和伤痛呈现的悲情效果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更能够把这种悲痛的经验植入同时代或隔代群体的历史记忆深处,并加以流转。潘受在为《血海》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也表明了该诗集的这一价值“裁以韵语,易记难忘,尤见深心所托。”<sup>[3]8</sup>可以说,诗史作为一种记忆形塑和传承的重要形式和媒介,在把孤立的个体记忆转化为交流型的文化记忆方面,有着相对于普通历史文献的独特价值。

### 三、《血海》对肃清大屠杀创伤记忆的形塑

借助杰佛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的解释框架,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解构诗集《血海》对新加坡肃清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书写和建构路径。正是源于它对这一创伤记忆的成功书写,检证大屠杀逐渐从华人特定鲜活个体的苦难经验升华为一种华人社群乃至人类整体的文化创伤,华人的苦难,也随之成为世界的苦难,华人的伤痛,也因之成为世界的伤痛。

#### (一) 伤痛的性质

个体或群体伤痛的性质主要包括伤痛来源和伤痛内容两个范畴。来源通常表现为两类,一是人祸,常见的如战争、饥荒等其他政治、社会事件;二是地震、旱灾、洪涝等自然灾害。伤痛的内容则指涉叙述

对象所遭受的不幸经验,也即特定的群体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创伤。

谢松山在《血海》中把肃清大屠杀的产生来源归结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军阀发动侵略战争,肆意践踏国际法的结果。《血海》开篇两首诗作总叙了新加坡沦陷的情形,突出英军溃降一幕,感事色彩尤其浓厚。诗云“十万英军齐解甲,可怜鸦雀寂无声。”“是谁城下签盟约,百万生灵釜底鱼。”<sup>[14]1-2</sup>据注文,1942年2月15日,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在旧福特汽车厂向日军司令山下奉文递交投降书,新加坡山河顿时变色。“十万英军齐解甲”一句充满着华侨群体对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未能尽到安全庇护责任的悲愤、失望,“百万生灵釜底鱼”则预示了百万侨胞注定的悲惨命运。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很快实施了大检证屠杀,谢松山对日军的这种做法和性质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为要维持其占领区之统治,不惜采用暴力恐怖主义,对占领区平民施行惨无人道之集体屠杀,蔑视国际公法,斯则惟有今次法西斯之侵略战争而已。”<sup>[3]12</sup>据日本军官明石阳至回忆,日本方面采取肃清行动的原因是:(一)他们的军队实力不足以维持治安的问题;(二)他们希望尽早确立治安局面;(三)他们担心游击队对日军可能采取的行动。<sup>[15]</sup>

在创伤内容的叙事和再现方面,由于大屠杀的开始源自于日本占领军的大检证,诗集在第四首和第五首中首先记载了检证的情形“尽驱民命入屠场,生死无从叩彼苍。嗟我华侨佳子弟,纷纷待宰似羔羊。”“露宿街头老弱随,琅琅铁锁任鞭笞。惊心夜半胡笳响,谁识明朝生命危。”根据两首诗后的注文,2月19日,许多驰行在道路上的日本军车上张贴布告,中有“一切华侨自十二岁起至六十岁止,各须自带六日干粮,前往指定集中地点,听候办理良民登记,如违处死等语。”<sup>[14]4-5</sup>诗中的“屠场”意指检证场所,道出了日军的残暴和华侨的凄惨。两首诗的诗文都表达了华人在检证过程中对自己明天生死难料的恐惧、无助和绝望。

从第十六首开始到第三十四首,是谢松山基于劫后余生者在法庭上的证词所书写的侨胞的血泪记忆,在此举两例加以说明。第十六首记载了日军在1942年2月底3月初实施的榜鹅海滨屠杀事件,诗云“旁鹅卜卜闻枪声,惨痛哀号不忍听。死后投尸葬鱼腹,精魂夜夜泣残更。”谢松山该诗的创作取材于证人谢益同、彭亚务以及一个印度裔卫生视察员的证词。据他们称“曾闻机关枪声,越数日往海滨,

见许多尸首浮于水而,尸体四五具系成一串,计有数串之多,尸均系男性,露体,无衣服,臃肿不成人形”“军押戮四五十名华人经过其处,直至海旁,旋闻枪声卜卜,哀号之声,惨不忍闻”。<sup>[14]16</sup>“精魂夜夜泣残更”一句表达了遇难者死后精魂不散,死不瞑目的哀戚。

第十八首是根据证人姚汉川法庭供词写成,描述了日军在蕙葛村实施的著名屠杀事件。诗云“来时满载去空空,蕙葛村前血海红。弱女教师齐毕命,祇余呜咽泣寒蛩。”受害人回忆道“余亲见三辆罗里车,满载中国人,经过漳宜区沙望蕙葛村余宅。车上有余友郑贞献在,郑原系某华校教师,此后郑君即无下落。该三辆罗里车经过不久便闻枪声,约半小时许,复有三车经过,时黄昏,辨不出车上之人,车回时均空无一人,每次均闻有机枪声,入夜复闻卜卜之声,如步枪然”<sup>[14]18</sup>“弱女教师齐毕命,祇余呜咽泣寒蛩。”一句揭示了日军连弱女教师都不放过的残暴一面,连昆虫蟋蟀都为之感伤而泣。

对于日军在占领新加坡初期实施的大屠杀中的种种惨烈,谢松山和其他序作者屡屡把其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作对比。我国现代诗人,时任槟城钟灵中学的管震民在《血海》序言四中,对此就痛言道“虽扬州十日,无兹饿殍;即嘉定三屠,逊此惨剧也。”<sup>[14]23</sup>

## (二) 受害人的性质

受害人性质的界定也即受害人身份再现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的新加坡人口中的族群结构和今天类似,主要有四大族群,华裔、马来裔、印度裔和欧美混血裔(也称“其他人”),其中,华裔占多数。在日本分而治之的族群政策下,检证和屠杀的对象多限于华裔族群。谢松山叙事的对象也是直指华侨遭遇,如他在第四首诗中的后两句对此予以明确“嗟我华侨佳子弟,纷纷待宰似羔羊。”<sup>[14]5</sup>谢松山在《血海》中,鲜有提及及其他族群在检证肃清屠杀中的经历。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子是讲到了一个欧美混血族裔和一个印度裔卫生视察员在庭审期间出庭作证,指控日军实施了检证屠杀的行为。新加坡学者白铁儿在《肃清的背后》一文中,也特别指出“无论是肃清还是奸杀掠夺,日军只针对华裔平民,而且每一次的搜捕行动,皇军都会让半岛的非华人清楚看到,日军并不打算干扰华族以外的居民。至少在既定政策和原则上,日军总部和高层三令五申下令不得无故冒犯或伤害非华族人士。”<sup>[16]176</sup>

根据山下奉文的命令,遭受检证屠杀的华人群

体的具体对象为:(1)星华义勇军成员;(2)共产党;(3)抢掠者;(4)拥有武器者;以及(5)出现在日军情报机关抗日嫌疑分子名单中者。<sup>[17]</sup>然而,检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毫无标准,各区负责人有着很大的随意选择性。如“日军认定戴眼镜的人就是知识分子,这些人立刻被定罪。当时,不仅受华文教育的人遭怀疑,受英文教育的人也一样。一些检证官触摸受检人的手,凡是手掌软绵绵的,就被列为知识分子,属于支持英国或中国的抗日分子。有时甚至蓄短发的人也会被怀疑是义勇军。”<sup>[18]</sup>《血海》的第20首诗云:识字谁知是祸胎,家财五万这边来。断头台上鬼神泣,九死一生亦幸哉。<sup>[14]16</sup>该首诗的注文讲到了华人幸存者邱亚林,仅仅因为识字被日军检证欲加害的行为,由此可见日军检证屠杀毫无章法和草菅人命的一面。

从1942年2月18日检证始,到同年3月初,在大屠杀中罹难的华侨人数尚缺少一个精准统计,日军方面称最多5000人被屠杀,但后来新加坡的学者估计高达20000到50000人。<sup>[19]</sup>谢松山在《血海》中对此也有专门提及,第35首诗云“乱命当年纪奉文,谁教召责领三军。糊涂人造糊涂帐,二万灾黎玉石焚。”<sup>[14]36</sup>该诗的注文显示,日方证人桥本男称,屠杀命令来自山下奉文,专捕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其数约15000-20000人,其中三分之二有相片,三分之一只有姓氏。

## (三) 创伤受害人与更广大的受众间的关系

受众也即作品面向和阅读的主要对象和群体。创伤被害人与广大受众间的关系形态再现是创伤记忆建构的一个关键,因为它关系到广大受众对该项记忆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我者”经验的体认。唯有被害人的创伤经验被再现时,表现出共享的集体认同的重要特质时,受众才能象征性地参与原初创伤所带来的经验。

谢松山创作《血海》时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作为苦难现场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谢松山在《血海》的文本中,以第一人称叙事,处处凸显的是华侨族群的同胞意识和血亲联系。他在《写在第三版出版前》的序言中写到“为使吾同胞获得加深一层印象起见,特搜罗若干有关此历史性的图片附入本书,俾读者得对此五年前吾同胞之空前浩劫与深仇大恨:永志不泯。”<sup>[31]</sup>“吾同胞”一词的反复运用表明谢松山在叙事中有着彰显“我者”意设的意图。南洋报人潘受也撰序道“隔一层薄纸,我们分明看见无数血肉模糊的鬼影,散血发而怒冲,张血目而怒视,攘血臂

而怒指。我们分明听到他们不断切血齿,不断顿血足,不断全体一致作血的抗诉。而这些鬼,百中九十四五,恰是我们离开了遥远祖国的诸姑,伯叔,姊妹,兄弟。”<sup>[14]8-9</sup>这种“同胞”和“诸姑,伯叔,姊妹,兄弟”关系的构筑无疑拉近了创伤受害者与广大潜在受众间认同构筑的心理距离。

以谢松山为首的一众华人作者通过对受害者与广大潜在受众间血缘、亲缘关联的强调,在他们间构建了一个同宗同源,血脉相连的同系“我”者、“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一种共享的苦痛经验由此得以构建,该诗集的受众进而能够自然地把大屠杀受害者的创伤,移情为自我的伤痛经验。

#### (四) 责任归属

责任归属即创伤施害者的认定和再现。《血海》中,谢松山把大屠杀创伤制造者的指陈对象直接认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血海》中处处充斥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泪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戴人头为冠,踞人骨为座,而以千千万万冤魂怨魄的悲号痛哭为鼓乐。踌躇满志,叫喊着说:我们创造了血海。”<sup>[3]7</sup>

创伤施害者的认定还体现在谢松山对日本战犯在审讯期间试图推脱战争罪责的严厉谴责上。庭审期间日本辩护律师及战犯进行诸多诡辩,如正常军事行动所需以及只是执行上峰命令等诿过于人的情形。如诗第三十八首“引经据典未来由,雄辩滔滔语不休。杀戮可能挽危局,顿教十日哭扬州。”该首诗记述了检证案审讯进入第八日的情形。被告日籍律师黑濑提出辩护:(一)一切屠杀均系当时因军事上所认为必须之步骤;(二)日军由北马南下,经多次之苦战,军纪已败坏;(三)地方纷乱,不得不下断然手段,以维持秩序,又下令者乃总司令,依照日本军法,下属祇有绝对服从上峰命令。当时反日高潮,到处皆有,非如此不能维持治安。并恢复社会之秩序。”据注文,针对以上说辞,主控官质问道“谓肃清反日份子,何以律师、教员、学生、政府人员及妇孺辈也在肃清之列乎?”<sup>[14]43</sup>在辩护律师指引下,第一被告西村琢磨也试图狡辩,诗三十九曰“谁坑赵卒缩兵符,辜昂昂藏八尺躯。不惜汗颜谈武道,罪归主帅汝知乎?”此诗亦表达了作者批判的态度。首两句斥责西村大肆屠戮华人,如战国时秦将白起坑杀赵卒般残酷。后两句则记述西村的辩词,他侃侃而谈称“屠杀一事,应由上峰负责,我为军人,祇有服从命令而已。继而大谈武士道精神。主控官华特少校则对其言论加以驳斥,质问武士道可以随意杀

人乎?将杀人之责诿诸上峰,亦合乎武士道精神乎?西村听后为之语塞。”<sup>[14]40</sup>这些诗句呈现了日本战犯百般狡辩,试图推脱罪责的场景以及作者对该行为的谴责。

英殖民当局对战犯的审讯在1947年4月2日作出判决,其中只有河村三郎和大石正行被判绞刑,其余五犯被判终身监禁。该结果很快得到东南亚盟军总部批准,于6月26日在樟宜监狱执行。新加坡华侨对此大感失望和不满,认为在罪证确凿,罪行昭彰的情况下,对其他五犯定罪过轻。“元恶巨凶,仅死其二,尸山血海之冤债,实未曾得偿,惨巨痛深之牺牲,乃轻若鸿毛”。<sup>[1]</sup>反映在《血海》第五十三首、五十四首“生死无端种夙因,空前浩劫已沉沦。可怜千万牺牲者,犹是家家梦里人”“悲哀往事记年年,血染河山迹未干。安得余凶齐授首,方伸冤抑到重泉。”<sup>[14]58-59</sup>尤其是“可怜千万牺牲者,犹是家家梦里人”“安得余凶齐授首,方伸冤抑到重泉。”两句充分表达了华侨对余凶未得到应有惩治,血债未得偿,死者英魂不得慰的不满、愤恨和遗憾。在新加坡学者看来,“1947年审判的结果,并没有使得华人社群的集体记忆与过去的暴力间断,反而在华人群体中滋生了一种血债未偿的印象。”<sup>[19]</sup>

#### 四、诗集《血海》创伤书写的价值诉求

曾在纳粹集中营饱受折磨的意大利犹太裔作家莱维曾提出记忆书写和再现的责任问题,“记忆的责任,乃是要记住纳粹大屠杀是一个关乎道德与政治的问题,而且对建构人类的未来尤为重要。”<sup>[20]</sup>美国学者埃尔曼也认为,“创伤书写过程可以诠释为一个意义竞争的过程,其间个体的和集体行为者试图界定它,并赋予其一个特定的含义。”<sup>[21]</sup>莱维所谓的记忆书写所需承担的“道德”和“政治”的建构责任,其实就是埃尔曼所称的赋予记忆以“意义”的过程。个体或特定群体藉由赋予创伤以普遍的“道德”情感和形塑人类命运的“政治”任务,进而完成文化创伤的建构,个体创伤从而具有了普世“意义”。历史记忆的形塑源于过去经验,受限于现实框架,同时指涉未来。《血海》这一创伤记忆的书写亦自不例外,它寄托着谢松山及序言作者们所代表的华侨社会的多种意义诉求与期待。

##### (一) 为时代存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谢松山编写诗集《血海》的第一个诉求便是纪史和存史,让人们铭记这一段血的教训和苦痛经验。他在第一版的自序末尾中

就直接指出“呜呼,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兹篇之作,亦在使吾同胞生生世世勿忘此悲情之历史而已!”<sup>[3]31</sup>从中可以看出,他以诗纪史,复以史为鉴的用意颇为明显。

曾心影在为改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肯定了《血海》的存史功能“书名血海,沉痛无穷,盖纪三年余之蒙难,哀九州府之劫运,由南洋商报刊为第八种丛书之一,所以存东亚战史之血笔,且为汛南洋忠烈之丹旌云。”<sup>[3]18</sup>在其他序文中,还有诸如谢云声之评“他年修纂星洲史,沦陷经过赖补遗”,欧阳雪峯之论“义正辞严良史笔,穷形尽相赖君传”以及谢廷生之言“轩若访华侨事,记取编存史乘中。”<sup>[3]27-28</sup>这些序文内容也都表明了《血海》一书所肩负的纪史与存史的价值使命和记忆之责。

## (二) 治愈创伤: 作为疗愈创伤的叙事

对过往创伤经验的纪录不仅在于历史镜鉴功能的发挥,而且能起到疗愈受害者创伤的作用。在台湾地区学者黄新雅看来,“书写创伤即在重新造访深藏的记忆,透过创伤的记忆不断的展演,释去,赋予沉默的过去一个声音。这种不断反覆的历程是种潜意识自发的疗伤企图,虽有重复痛苦的危险,却出自创伤幸存者吸收和消解创伤经验的欲求,此一欲求的满足为复原疗伤的第一步。”<sup>[22]</sup>她也同样肯定了叙事对修复创伤的意义“所谓修复创伤不是把本来沉默的创伤掩埋在潜意识里,而是在叙事想象和建构中咀嚼创伤,把它从内心深渊拯救出来,赋予它具体形态和面目,使它成为创伤主体现实生活一部分”“无论书写或是绘画,都是一种能让患者放下包袱、直陈内心所想,甚至进而稳固自己的方式。”<sup>[23]</sup>

谢松山《血海》的撰写无疑怀有消解华人群体大屠杀创伤的意图。他在序言中指出,“人类是有情感的动物,见他人悲则悲,见他人喜则喜,这种伟大的同情心,是人群进化的里程碑,是社会互助的有力支柱,人类苟无这种同情心,世界将立即陷于毁灭。读我这一本书的人,相信是对千千万万无故被驱往郊外或海滨活活杀死的同胞表示无穷的哀悼。”<sup>[3]11</sup>表达了他寄予广大读者树立同情心,并对直接创伤受害者予以追思的一种期许。华侨报人曾铁忱在为第三版《血海》写的序言中,题了一首名为《悲哀往事记年年》的哀感七绝,在该诗的注文中,他表达了对该书能抚慰创伤的期待。“《血海》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战争之残酷性写成了这部血史,我想读《血海》的每一个人都要怀着沉重的心情,带

泪来抚摩自己创痛巨深的往事。”<sup>[3]4</sup>管震民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也表达了这种寄托“是书义正辞严,直秉董狐之笔,穷形尽相,如燃温峤之犀;血泪盈盈,历千秋而不灭!海天淼淼,亘万古而犹腥……惟祈血化苍宏,尽洗昭南之污迹,更望海填精卫,永平星岛之回潮。”<sup>[3]24</sup>

总之,正是通过书写,人们的思想、意识与情感经验得以显现,而书写反过来也重新形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感受,影响人们的思维。“社会支持的低感知度被视为一个创伤压力的指征。如果一个人经历了创伤事件,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感知到他们有一个充分的社会支持,那么他们要比意识到有一个充分的社会支持更又可能感到伤害。我们叙述的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与愿意与他们合作,愿意恰当聆听的他人产生互动。社会支持就是用来通过讨论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的问题。”<sup>[8]3</sup>面对战后初期华侨社会中弥漫的检证屠杀创痛,谢松山《血海》对战时华裔有关大屠杀的创伤书写也自然含有安抚创伤的意味。

## (三) 和平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原子弹展露出的惨烈性给谢松山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在头版自序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范围之广泛与毁灭性之强烈,为人类有史以来所仅见。战场上之杀伐,惨酷固成空前绝后,而因科学之进步与兵器之日新月异,使后方人民亦不能避免锋镝,原子弹之发明,使广岛长崎两城市瞬息化为灰烬,数十万生灵同赴鬼域。”<sup>[3]29</sup>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刚刚隐去,世界各地硝烟再起。同处东南亚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遭至法荷的再征服战争,第三版出版时,又值东北亚的朝鲜战争爆发。国际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的无视,引起了新马地区一众华裔知识精英的哀叹,谢松山疾呼“这本书所叙述日人的前因后果不可作为人们的警惕么!不幸世界尚有那些执迷不悟的人,现在又在制造他们的罪恶,煽动另一次的烽火了。”<sup>[3]12</sup>姚紫也叹息道“可怜这《血海》的史实,距离现在不过五年,血尚未干,骨还未寒,世界战争贩子父在吹动着死亡的号角了!当年使半个地球充满腥风血雨的军国主义,又在死灰复燃,鼓起千丈的毒焰!”<sup>[3]15</sup>

故而,在彼时硝烟再起的国际形势中,《血海》一书的创作旨趣充满着警示世人,反思历史和建构战后永久和平的期许。连士升论道“现在《血海》即将付印,我相信作者的意思不是清算旧账,而是要

证明战争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可惜,人类太健忘,战争刚好结束三周年,那些战争贩子,军火商人恨不得马上再制造战争。我希望战争贩子,军火商人有机会读这本书,看他们所造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假如他们能够幡然悔悟,放下屠刀,使世界和平增加一些力量,那么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很有意义。”<sup>[3]22</sup>《南洋商报》编辑曾铁忱在该书第三版的序言中也表达了对危局再起的忧思与对《血海》一书和平建设的寄托,“这血海一般深的冤仇已足够使我们椎心泣血了,默诵工部祈求和平的诗句:安得壮士挽天河,洗净甲兵长不用。我们唯有祈求发挥人性的良知,消除战争的祸根;要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要这样也才能化血海为生路。”<sup>[3]5</sup>潘受也表达了对和平的憧憬“总该有那么一天,人类从骄妄贪婪的烂醉中觉醒过来,爱代替憎,琴代替剑,饕代替斗。进化的历程,只洒汗浆,不露血迹;人人皆亲,人类十亲,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松山先生这一册书,也可以绝版。”<sup>[3]7</sup>

谢松山《血海》中肃清大屠杀记忆的书写,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化解怨恨,抚平伤痕,并寄希望于人类吸取教训,珍视和平,建设持久和平。赵静蓉教授在谈及创伤记忆构建的根本意义时,曾指出“在集体层面上的创伤记忆及其保存、传播和反思,是不受个体、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制的,它以人性的道德责任为基础,以人类对文明和未来的共同愿望为支撑。创伤记忆的真正意义,不是重述人类个体或集体经验过的痛苦和伤害,也即不是创伤经历本身,而是这一事件对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性的松动与震撼,以及由此提供给人类的“震惊和恐惧”是如何被人类克服并有可能最终拯救人类。”<sup>[24]</sup>在新加坡学者林立看来,《血海》创作的目的是最重要的价值,也就在于“勾起后人的记忆与反思,让他们吸取教训,勿让类似的悲剧历史重演。”<sup>[10]</sup>

#### 四、结语

回望历史,从唐代生民罹难的安史之乱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抗日战争,善陈史事,寓意褒贬的诗歌与国家民族苦难的创伤书写总是息息相连,在记忆和纾解中华民族的苦难和痛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谢松山的旧体诗集《血海》通过短歌当哭的写实主义手法,自觉承担了这种书写世乱的使命感和记忆之责。他通过诗歌固有的赋比兴、用典的修辞感事,取材自身战时经历及其他劫后余生大屠杀亲

历者的血泪经验,成功构筑了新加坡检证大屠杀时期华侨群体的活生生、血淋淋的集体创伤记忆。

《血海》一书对新加坡肃清大屠杀创伤的书写有着多层的意义建构和记忆之责的担当。除了记录这一民族苦难经历和寄托浩劫余生者对亲人的哀思以及自身的创伤纾解外,更有着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联结的意指。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谢松山及其他序文作者通过创伤记忆的成功书写,把大屠杀经历中的单一个体创伤,建构为整个华人社群集体的创伤,进而演绎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伤和苦痛符号,给了世人以“战争勿再来”的警醒,创伤记忆书写的旨趣随之提升到形塑人类未来的层面。谢松山及一众序文作者们和平愿景的实现之日,也即是对新加坡“肃清”大屠杀遇害者和劫后余生者给予最大的抚慰之时,《血海》一书的记忆之责自当终结,从此也可以绝版矣。

#### 参考文献:

- [1] 许钰. 昭南时代检证大屠杀案始末记 [J]. 南洋杂志(新加坡), 1947(6): 115-118.
- [2] 刘抗. 杂碎画集: 序言 [M]. 新加坡: 八方艺苑有限公司, 1991.
- [3] 谢松山. 血海·序言: 第3版 [M]. 新加坡: 南洋商报出版有限公司, 1950.
- [4] 张连红.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3.
- [5] Wai Keng Kwok. Justice Done Crimin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Chinese Massacres Trial Singapore, 1947 [M]. Genocide Studies Program Working Paper 2001: 1.
- [6]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6.
- [7] Ansgar Nünning (Hg.), Astrid Erl.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M].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 New York 2008, S: 109.
- [8] Nigel C. Hunt. Memory, War, and Trauma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9]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A]. //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10] 林立. 亦诗亦史: 描述新加坡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血海》 [J]. 清华学报 2017(3): 547-589.
- [11] 李世英, 陈水云. 清代诗学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26.
- [12]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9.
- [13] 钱钟书. 宋诗选注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4.
- [14] 谢松山. 血海: 第3版 [M]. 新加坡: 南洋商报出版有限公司, 1950.
- [15] 明石阳至, 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 [A]. // 许云樵, 蔡史君.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G]. 张清江, 译. 新加坡文史出版社



- 人有限公司,1984:319.
- [16] 白铁儿. 肃清的背后 [A]. [新加坡]冯仲汉主编: 居安思危: 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 [G]. 新加坡: 亚太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176.
- [17] Tan S., et al. Syonan Years, 1942 - 1945: Living beneath the Rising sun [M].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9: 15.
- [18]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昭南时代 -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 [M].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2008: 111.
- [19] Kevin Blackbur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of Singapore [J].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0(2): 78.
- [20] Barbara A. Misztal,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M]. Maidenhead,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4.
- [21] Eyerman R., Madigan T., Ring M., Cultural Trauma,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Vietnam War [J]. Croat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4, No. 1 - 2, 2017: 13.
- [22] 黄心雅. 广岛的创伤: 灾难、记忆与文学的见证 [J]. 中外文学, 2002(9): 86 - 117.
- [23] 赵静蓉. 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 [J]. 学术研究, 2017(1): 144 - 151.
- [24] 赵静蓉. 创伤记忆: 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2): 110 - 119.

责任编辑: 朱学平

## Traumatic Memory Writing About Singapore's Sook Ching Massacre in the Bloody Sea

ZHU Dawei

(The Center for Singapore Studies,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Xie Songshan, a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painful experiences of his own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wartime, wrote a classic poetry collection the Blood Sea, which was a publish record in Nanyang for a time. This book inherited the narrating tradition of the national sufferings in the Chinese poetry histor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pecialty of the poetry in terms of narrating and sensation. It reappeared the Chinese community's collective traumatic memory of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nature of the trauma, the nature of the victi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uma victims and the wider audience, as well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The purpose of Xie Songshan's traumatic memory writing was not to remember hatred or seek revenge, but to transform the individual's communicative memory into the cultural trauma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and even the entire human race by means of endowing it with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shaping human's moral ethics and future destiny under the context of collectivism and universe and eventually to take the memorial responsibility of writing history, preserving history, healing trauma and building long-lasting peace to the world.

**Key words:** Singapore; Syonan; *Bloody Sea*; Sook Ching Massacre; cultural trauma